

教材与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材体系建设研究

赵兴胜，史可人

摘要：探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材建设历程，既要重视普通教育领域，也要重视体系更为庞大、内容更加丰富的干部教育领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办学期间，建立起了总量可观、来源多样、内容鲜活生动的教材体系。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并率先垂范，教材编者队伍不断扩大充实，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不断更新。抗大的干部教育教材体系呈现了以抗战为中心、加强政治改造，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及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最新经验吸收入教材之中。

关键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战教育；干部教育；教材史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3-0029-1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材事业是近年来教育史、教材史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来看，在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教育事业中，以中小学为核心的普通教育并非首要任务，“居于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①的是干部教育。尤其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党中央明确要求，“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并强调指出，“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②因此，在探讨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教材事业时，不能仅局限在普通教育，要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体系更为庞大、内容更加丰富的干部教育领域。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相关历史实践为例，对其干部教育教材体系的建设历程、体系构成、内容特点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其整体样貌及特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16KZD021）。

作者简介：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史可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① 宋荐戈、张腾霄著：《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一、缘起：抗大教材体系建设的思想与组织

抗大始于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更名，并迁至延安。至抗日战争胜利，抗大累计培养各类军政干部10多万人。^①据统计，仅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②正是由于抗大在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对它的研究向来是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部分成果涉及了教材问题，如张天浩、赵虎、丁小丽、魏凌锋等。然而，抗大为什么要开展教材建设？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是如何组织实施的？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仍缺少系统清晰的梳理。就笔者所见，启动该项工作的直接原因在于解抗大成立初期的“教材荒”。抗大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在开学典礼上用“四没有”来描述抗大的办学困境，即“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③，其中的“教材荒”由此可见。为解决该问题，他曾反复督促相关部门加快教材采购工作。例如，1936年8月，他与时任抗大校长林彪电告时任抗大第一期第三科科长周昆和政治委员袁国平：“全国图书目录望交人带来，应买之战略、战役、战术书籍请先电告。”^④同年9月7日，他又致电远在西安的时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急切地问道，“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⑤；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强调：“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还曾辗转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抗日军政大学缺战略教材，请在苏搜集战略书，同时并请找人翻译后寄回来”^⑦。通过上述渠道，抗大从国统区和苏联引进了一批急需教材。但是，引进的教材不是都能满足革命战争尤其是后来的抗日战争的需要。随着抗大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学内容的日渐丰富，单靠购买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自1938年起，毛泽东开始不断倡导和督促自编教材。例如，他在抗大第三期教学总结会上就提议自编军事和政治工作教材，并自荐负责游击战争教材以及部分战略教材的编写。^⑧抗大的教材编写工作由此全面启动。

抗大教材编写的组织体系有着以下鲜明特点。

（一）教材编写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日渐完善

早在193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就曾探讨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并批评“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⑨。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清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1938年6月，作为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仍尖锐地批评：“若不克服这种教条文

①④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00、512页。

② 《抗大九年 走出7元帅10大将》，《文摘报》2017年7月13日。

③ 王智涛著，王亚明、王亚慧、伊兵整理：《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⑤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588页。

⑧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20页。

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所学所得，除了多记得几个死的词句，于实际究有多大用处呢？”^①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检查运动的号召。据此，抗大也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全方位检查，亦包括教材问题。其中尤以时任副校长罗瑞卿的思想观点最为系统和深入。一方面，他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军事教育始终落在客观环境需要的后面”“教材的内容也还有许多不妥当、不精粹甚至陈旧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总结既有经验基础上，对提升教材编纂水平，提出了系统性指导意见。具体而言：（1）在思想上，要强调“中国化与现实化”^②，强调任何军事政治理论的东西，都必须求其中国化与现实化，“公式条文的抄袭，生硬原则的引用，是不会有受益的”^③；（2）在内容上，要强调以“少而精”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编排，必须好好搜集与研究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与丰富经验，并将其反映在教材内容上；（3）在方法上，强调“集体研究与集体创作”^④，这比使用个人作品要更加完善与充实，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员相互听课研究与批评，要注意召开教员教育准备会、教育检查会，以加强经验交流；（4）要根据斗争需要和实践经验的变化，不断审查、充实与改进教材，特别是对已有教材，要严格审查，并作适合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党的六中全会精神与前方新的抗战经验。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可以肯定地说，罗瑞卿的上述观点就是抗大的教材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后文的事实也表明，这一思想的指导意义是巨大的。

（二）不断充实作者队伍

抗大成立之初，组织体系比较简单。但从第二期开始，逐渐稳定下来，其教学工作主要由训练部及其之下的政治教育科和军事教育科承担。到第五期（1939.1—1940.3）时组织已经比较完善，体系也比较成熟。例如：政治教育科下设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教研室；军事教育科下设战术、炮兵、工兵地形等教研室。与此相应，师资队伍也得到明显扩充，从成立之初的固定教员三人，发展到1938年年底的军政教员二百多人、教职员近千人（延安本校）。^⑤其中，除了前述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有一大批在全国理论界早已成名的知名学者，或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例如，在政治教育方面的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庆孚、杨兰史、张如心、徐懋庸、薛暮桥等人，在军事教育方面的郭化若、王智涛、刘清明、赖光勋等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彭庆昭、李凡夫、吴植楷等人。^⑥这为开展教材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从1938年7月，也就是从第四期开始，抗大增设了专门的编译科，负责军事教材的编译工作^⑦，以贯彻落实中央相关工作要求，解决“教材荒”问题。此后，还成立了军事研

① 《红大教育工作的一点经验》，罗瑞卿著：《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②④ 罗瑞卿：《抗大教学的经验》，《解放》1939年第73期。

③ 《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工作（续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6期，1939年。

⑤ 许光达：《抗大最近的动向》，《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2期，1939年。

⑥ 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600页；《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8页；姜廷玉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人物志》，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贺海轮主编：《延安时期著名人物》，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名人故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彭庆昭、吴植楷等合编《中学算术课本》第3册，出版地址、年份不详。

⑦ 《在抗大》，《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究室,抽调骨干教员,专门负责搜集各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实战案例进行整理研究并编成教材,用于经验推广。^①这极大地推动了该校教材的编纂工作。据统计,仅第七期期间(1941.1—1941.12)就编译出版了军事、政治、文化、后勤等教材41种,发行量达18 036册,部分教材更是因质量高而深受学员和部队欢迎。^②

此外,当时延安各党政机关、教学科研单位的部分知名学者、文化人士,也通过许多渠道应邀加入到教材编写队伍中来,如曾任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徐特立,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范文澜,曾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陕北公学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员的何干之,曾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和国际宣传处处长的张仲实,曾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社编辑的徐冰,等等。

(三) 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率先垂范,多方面参与教材建设

毛泽东不断督促指导教材体系的建设。1940年12月,他与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的王稼祥,联名致电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要求其“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次年8月,他又代表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滕代远,明确要求抗大总校要“有计划地整编教材及总结教育经验”。同时,他也以身作则为抗大写讲稿、编教材。抗大成立之初,为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在毛泽东提议下,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袁国平、董必武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出任学校首批教员。同时,他还担任了该校教育委员会主席,并承担了多门课程,亲自精心备课、撰写讲义。根据记载,他在抗大第一期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日夜赶写讲义;每写成一章,就去讲演一章。每次讲课前一天的夜里,都在树前挂上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③这次授课历时近两个月,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才停下来。^④又如,1938年4月至8月,他为抗大第三期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前,他通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最终完成该课程讲授提纲的撰写工作,该课每周二、四上午授课,下午是学员的讨论环节,历时三个月,讲课110多小时。^⑤此外,他还为抗大授课或讲演专门写作过《基础战术》等著作。

在上述著作中,有许多事后即被列为抗大必修教材,且长期使用。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从第四期开始即成为抗大学员的必读书目^⑥;辩证法唯物论课程一结束,抗大政治部即将其讲授提纲整理油印,作为延安各校哲学课程的主要参考和依据^⑦,特

① 王智涛著,王亚明、王亚慧、伊兵整理:《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05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③ 吴继金:《毛泽东讲党课》,《世纪风采》2018年第5期。

④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635、673页。

⑥ 曲跃厚、王景荣:《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等编:《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⑦ 许全兴:《有关〈实践论〉〈矛盾论〉文本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4期。

别是其中两章单独整理出版后，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而著称于世。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刘少奇、朱德、罗瑞卿等也为抗大提供了不少教材。例如，刘少奇加工修改了在抗大和马列学院的演讲稿后，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最终出版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共产党员的经典文本。^①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抗日战争》等著作也通过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出版社出版，成为抗大教材。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1938年11月写于延安抗大，先于《解放》周刊连载、解放社出版，之后生活书店和武汉国统区的汉口中国出版社亦不断再版。^②

简言之，以上述工作为基础，抗大从成立之初在教材上处于空白状态，到抗战胜利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和丰富的体系。

二、抗大教材的类型与特点

狭义的教材指教科书、课本。广义上的教材是指课堂上和课堂外较适合学生使用的教学材料，比如课本、练习册、活动册、自学手册、教学挂图、教学卡片、教师自制的补充练习、课外自读材料等纸质材料。抗大九年办学历程中编纂、使用过哪些教材？窃以为，搞清这些问题是研究抗大教材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总结抗大办学特点与经验的基础。但就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分析，绝大多数还是散见在各种报刊或历史回忆资料中，且大多版本文献信息不全。鉴于此，笔者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整理如下。

整体上看，抗大教材体系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政治类教材、军事类教材和文化类教材，这是由其课程体系所决定的。

（一）政治类教材

政治教育是抗大办学的基本任务。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时就曾强调，来抗大“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③1939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也指出“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要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④为此，抗大在各个时期都设有大量政治课程，主要包括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民众动员、政治常识、政治工作、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日本问题等。但是，目前学界对支撑这些课程教学的教材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在综合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笔者对抗大的政治类教材作了初步考证（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至抗战胜利前夕，抗大的政治课基本上都已配齐教材，其中部分是自编的，部分翻译自国外，部分则是采购自战前国统区的出版物，有些课程甚至配置了多种教材。其中蕴含的探索、努力及其意义，毋庸赘述。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

② 张树德主编：《罗瑞卿大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页。

③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④ 《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页。

表1 抗大政治类教材

教材类型	作者/译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发表时间
哲学	艾思奇	《大众哲学》	读书生活社	1936年
		《哲学研究纲要》	拓荒出版社	1939年
	毛泽东	《唯物证法讲授提纲》	—	1938年
	吴黎平、艾思奇	《唯物史观》	解放社	1939年
	何思敬译	《哲学的贫困》	—	—
马列主义	斯大林	《列宁主义概论》	解放社	1937年
		《列宁主义问题》	解放社	1938年
	马克思、恩格斯著，徐冰译	《共产党宣言》	中国出版社	1938年
	任白戈译	《列宁的辩证法》	—	—
	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资本论》	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年
	阿多拉茨基著，柯雪飞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	播种社	1938年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38年
	列宁	《列宁选集》	解放社	1939年
	沈志远译	《辩证唯物论》	—	—
	何思敬、徐冰译	《哥达纲领批判》	—	1939年
	—	《辩证法与唯物论》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	1939年
	—	《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基础》	—	—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薛暮桥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1942年
	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解放社	1945年
	—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印	—
政治经济学	李昂吉叶夫著，张仲实译	《政治经济学讲话》	生活书店	1939年
	抗大总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政治经济学讲授大纲》	—	—
	薛暮桥	《政治经济学》	山东新华书店	1939年
	沈志远	《新经济学大纲》	北平经济学社	1936年
中国问题	毛泽东	《论新阶段》	新华日报馆	1939年
		《新民主主义论》	解放社	1943年
		《论联合政府》	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5年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

续表

教材类型	作者/译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发表时间
中国问题	抗大总校	《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十分校油印	—
	张闻天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解放社	1937年
	钱亦石	《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	生活书店	1936年
	何干之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	生活书店	1938年
	华北新华书店编印	《国共会谈材料汇集》	—	1945年
党的建设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新华书店	1939年
	—	《政工条例》《政治工作》 《党的建设》《党的政策》	—	—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1938年
		《共产党人发刊词》	—	1939年
		《改造我们的学习》	—	—
		《反对主观主义》	华北新华书店	1942年
	—	《论共产党》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	1940年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编印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	1943年
	陈伯达	《三民主义概论》	中国文化社	1939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	《论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	—
	凯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	解放社	1938年
社会科学	徐懋庸	《社会科学概论》	—	—
		《社会科学基础教程》	—	—
民众动员	陈传钢编	《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	新知书店	1939年
边区建设	—	《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	新华书店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	《法令汇编》第一分册	韬奋书店	1945年
帝国主义	李公朴主编	《帝国主义》	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6年
国际关系	曹伯韩	《国际关系》	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年
日本问题	张健甫	《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	生活书店	1937年
	李凡夫、何干之	《中日国力的对比》	引擎出版社	1936年

资料来源：（1）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5年第2期；（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抗大参谋训练队回忆录编辑组编：《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出版者不详，1995年；（4）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6）《陇东革命史料选辑》第1辑，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编印；（7）《诸城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诸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10）大连市史志办、抗大大连校友会编：《抗大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1）《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

出版社1987年版；(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3)《汉阳县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4)陆廷荣主编：《战斗在冀鲁豫平原——冀鲁豫党史资料选辑之八》，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5)何长工著：《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8)张天浩：《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学术探索》2021年第5期；(19)赵虎：《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干部学员培养研究——以抗大前三期为例》，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20)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藏文献目录。

(二) 军事类教材

毛泽东也指出，“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其中战略战术是重点。^①与此相应，抗大的课程体系里面始终开设有大量的军事课程，主要包括战略学、游击战争、军队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射击学、地形学、建城学、技术兵种、姿势教练、步兵战术、参谋等。但是，支撑这些课程教学的教材也没有人进行梳理分析。表2是笔者的初步考证结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表2中可以发现，与政治类教材相比，军事类教材基本上以自编为主。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产生的重大影响不言自明。

表2 抗大军事类教材

教材类型	作者/译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发表时间
战略学	毛泽东	《论持久战》	解放社	1942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解放社	1938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
游击战争	朱德	《论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社	1938年
		《论解放区战场》	华北新华书店	1945年
	抗大总校编印	《1942年夏季出击总结材料》	—	1942年
步兵战术	郭化若	《抗日的步兵战术问答》	前卫社	1941年
	抗大/毛泽东	《基础战术讲座》(抗大讲义)	少年书社	1938年
	抗大总校编译科印	《(苏联工农红军底)步兵战斗条令》(八路军司令部军事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	—	1940年
	高孚、田牧编，梁坤生制图	《刺杀教练》	八路军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	1941年
	—	《防空》《制式教练》《步兵操典》(油印本)	—	—
游击战术	郭化若、周纯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中国文化社	1939年
	彭雪枫	《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	—	1939年
		《战略战术讲授提纲》	—	1939年
	左 权	《埋伏与袭击》	抗大总校训练部刊印	1940年
	王智涛	《战术学》	—	—

^①《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

续表

教材类型	作者/译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发表时间
游击战术	抗大总校编印	《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抗日游击战术》《伏击战》《游击战》《急袭战》《地雷战》《捕捉战》《联防战》《麻雀战》《破袭战》《战例》	—	—
参谋	抗大总校编印	《参谋业务》	—	1941年
军队政治工作	罗瑞卿	《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解放社	1938年
	抗大二分校编印	《军事问答一百条》	—	—
	—	《内务条例》《纪律条令》	—	—
射击学	—	《射击教范》	—	—

资料来源：（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3）陆廷荣主编：《战斗在冀鲁豫平原——冀鲁豫党史资料选辑之八》，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4）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6）《邢台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邢台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8）《诸城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诸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9）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编：《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上册，原子能出版社1993年版；（10）林子秋著：《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11）张天浩：《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学术探索》2021年第5期；（12）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藏文献目录。

（三）文化类教材

受各种因素影响，党领导下的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所接受的教育都不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抗大第五期为例，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员占比达64%，小学程度占26%，大学以上程度者仅占10%。^①而抗大第六期学员的文化程度则更低，文盲与半文盲占43%，高小程度占24%，中学程度占31%，大学程度仅占2%。^②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③。因此，抗大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文化教育。毛泽东曾为增加文化课事宜致信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局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

^{①②} 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8、99页。

^③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2页。

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①与此相应，抗大始终开设了国文、算数、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为了支撑这些课程的教学，抗大也以自编为主，完成了相应教材的配置工作（见表3）。

表3 抗大文化类教材

教材类型	作者/译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国文	范文澜等	《中级国文选》（1—4册）	华北新华书店	1942—1945年
	抗大总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高级国文选》	—	1944年
算数	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研究室编，彭庆昭等合编	《中学算术课本》	—	—
历史	徐懋庸主编	《中国历史简明教程》（1—4册）	华北新华书店	1942—1943年
地理	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研究室编，任白戈、张冰主编	《中国地理读本》（1—3册）	华北新华书店	1941—1943年
自然常识	抗大七分校编印	《自然常识》	—	1945年
	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研究室编，彭庆昭执笔	《自然常识》	华北新华书店	—
其他	抗大编审委员会编	《生产战线上的抗大》	八路军总政治部	1939年
	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	《文化课本》	解放社	1942年

资料来源：（1）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语言文字分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3）《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4）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藏文献目录。

受时间、精力及资料所限，以上所列肯定存在疏漏之处。特别是抗大各分校办学分散，文献存留不多，得到整理统计者很少。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看到抗大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教材建设成就。具体而言：（1）教材总量可观，在100种以上；（2）教材来源多样，有的翻译自国外，有的以中共领导人相关著作为基础，有的由抗大组织人员自己编写，有的购买自国统区、沦陷区；（3）它们保障了抗大的教学工作，同时记录、总结了中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经验。

三、抗大教材的内容特点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党和国家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事实上，前述各种应对“教材荒”的措施，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参与教材撰写，就是贯彻党和国家意志的一种策略。以此为基础，抗大的教材在内容编选上也体现出了这一重要而鲜明的特点。

（一）以抗战为中心，加强政治改造

早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②的要求。如前所述，抗大基本实现了这一任务。

①《致林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②《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页。

一是加强教材审查审核。这个问题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办学试验后逐步认识到并开始强化的。1940年12月，中央军委在有关加强抗大总校领导地位的指示中，首次明确提出：“应当注意总结经验，指示方针，统一材料之编印，统一各科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①1941年4月，罗瑞卿、张际春、何长工等抗大领导在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教材统一编印的流程为“有经验的教员拟出，有关教员主任与教员讨论，军政教科审，最后交编审会审阅”，并强调每一份编写提纲都要经过讨论^②；同年8月，中央军委致电前方将领，明确提出有计划地整编教材及总结教育经验是抗大总校的主要任务之一^③。为此，抗大专门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但受资料所限，有关该委员会的组织体制、人员构成、主要活动等，笔者还无法进行清晰还原。

二是紧跟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有关这一点，中共中央在加强干部教育的有关决定中曾明确提出，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④。抗大在教材撰写和使用中也严格执行了这一要求。例如，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抗大就立即召开了相关会议，传达学习全会精神，通过了《为实现抗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的决议》；会后还把毛泽东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印发给师生，有的是全文印发，有的则是摘取其中部分篇章。整风运动开始后，抗大集中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种文件，其中就包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⑤有些教材则是根据地重大方针政策的汇编，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印的《法令汇编》，就包括了该区制订和实行的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劳工保护暂行条例、婚姻暂行条例等。^⑥这类教材对于传播党的思想理念、宣传党的政策措施、凝聚党政干部的共识的作用是可以预见的。

三是寓政治教育特别是抗战教育于文化普及中。以范文澜等人编写的《中级国文选》为例，其中《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列宁吃墨水壶的故事》《简政不是减政》《平型关的胜利》等篇目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政策性、时代性，抗战色彩浓厚。^⑦即使那些关于自然科学的教材，也融入了大量适应抗战需求的相关知识，如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究室编写《中国地理读本》在介绍中国地理情况的基础上，添加了多篇抗日根据地与边区建设的课文，对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的边界划分、发展历程、地理状况进行了说明介绍。^⑧适用于抗大工农干部队文化课的教材《自然常识》则明确注明其教学对象“是已具有工作经验和其他斗争知识的成年干部，现在是回过头来补习文化知识”“要求多讲些实际上有用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② 《抗大总校教育计划总结》，白鸿森主编：《抗大在华北敌后》，大连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

⑤ 《整顿三风文件二十二种》，华北新华书店1942年版。

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法令汇编》第一分册，韬奋书店1945年版。

⑦ 范文澜等编：《中级国文选》第一册，新华书店1943年版。

⑧ 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究室编辑：《中国地理读本》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版。

的东西”^①。在抗大七分校编印的《自然常识》课本中还添加了大量毒气战的内容。这部分的复习题也与战争紧密相关，如设置了“普通作战中容易遇到哪一种毒气，遇到后的现象如何？根据你的经验，毒气对我们的威胁力如何？你认为在战争情况下应该有些什么防毒准备？”^②等问题，深刻体现了文化教材紧贴抗战需求的特点。

（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个重大时期。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就是他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强调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此后，他还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其次，在实践层面取得了革命性成就，即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和发展。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要教育学生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指导实践。^④最后，理论上走向成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支撑这一思想体系的众多经典文献的问世，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被作为教材广泛使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传播到全部抗大师生。

（三）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最新经验纳入教材之中

中共很早就重视对革命经验的总结、提升和示范推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需要，党更加强调对革命经验的及时总结。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进行教学总结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十年来的战争经验我们在军事上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⑤

抗大在其教材编纂过程中积极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罗瑞卿就曾多次强调，教材编写不能“只有公式条文的抄袭、生硬原则的引用……在编辑教材的时候，必须好好搜集与研究当前中国革命运动中之许多实际的问题……并将其反映于教材内容上来”^⑥。1942年8月，陈毅也指出，在军事教育方面，要“把握军事科学中的规律性，而同时又要使学生能够根据一般的军事原则去研究目前的实际的作战经验，总结中国革命中过去各时期的战争经验”^⑦。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抗大教材体系，可以说是充分吸纳了中共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最新经验。举其要者如以下三点。

① 抗大政治文化教育教研室编印，彭庆昭执笔：《自然常识》上册，出版年份不详，第1页。

② 《自然常识（甲级用）》，抗大七分校1945年编印，第17—2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⑥ 罗瑞卿：《抗大教学的经验》，《解放》1939年第73期。

⑦ 《对抗大工作的建议》，陈毅著：《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其一，有些是对刚刚结束的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是典型代表。它从如何研究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和反“围剿”、战略防御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打好“第一个战斗”的三大原则，即“必须打胜”“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①郭化若也总结了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队关于给养保障问题的经验教训，并主张将其应用于抗日战争中。^②

其二，有些是对正在进行的抗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例如，毛泽东总结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持久的，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③他编写的讲义《基础战术》涵盖战术、组织、任务、动作、袭击、埋伏、通信、训练、政治工作等方面，指出“现在的国际战争，它的残酷，出乎我们意外”“我们应该以最刚强的奋斗精神，最热烈的爱国情绪，和持久的意志，去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④更多则是对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如彭雪枫整理的游击战的实战经验以教材的形式出版。^⑤《战术学》则是抗大军事教育科科长王智涛带领参观团先后到晋西北、晋察冀部队参观见学，总结战斗经验，整理战例后所写。^⑥

其三，有些则是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经验的总结。部分是关于政权建设方面的，如《党的建设》《党的政治》《政治工作》等相关教材；有的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如《生产战线上的抗大》记录了抗大师生边学习边进行生产劳动的情况，包括《全校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生产运动中的炊事问题》《生产运动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开荒》等选文。其在末尾附的《抗大生产运动总计划》详细规定了延安生产总会分配情形、抗大一般劳动力支配情形、按学实际劳动力具体解决办法、粗细粮比重、出产量与土地面积之比、耕种面积、工具（牛犁）与种子使用。^⑦

曾任抗大训练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的许光达曾指出，“教育的任务，在于改造人；使之获得改造社会的工作能力。为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教育原则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并且严格落实这些方针、原则、制度，如此一来教育便能收到实效。^⑧关于抗大教材的使用“实效”，以下两人的回忆可以证明。曾任抗大政治教员、组织部部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曾写道：“拿到教材的同志如获至宝，经常是如饥似渴地挑灯夜读，即使在行军转移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也是争分夺秒地埋头读书，学习空气十分浓厚。”^⑨时任抗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1—503页。

② 郭化若、周纯全等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中国文化社1939年版，第98—99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1938年第43、44期合刊。

④ 毛泽东讲述：《基础战术》，自强出版社1938年版，第2页。

⑤ 《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前言，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等编：《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⑥ 欧阳毅：《回顾抗大总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30页。

⑦ 抗大编审委员会编：《生产战线上的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1939年印。

⑧ 许光达：《抗大三分校的教育概状》，《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期，1940年。

⑨ 李志民：《抗大第十分校》，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大总校政治教员的尚可曾回忆，通过学习教材，他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从事革命工作的法宝”，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开，“基于这种认识，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中，我宁愿丢掉其他东西，也要千方百计把马克思主义讲义保藏好”。^②陆费逵曾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③抗大的经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教材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成功之处，也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密码。

（责任编辑：汤浩泽）

Textbook and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Syste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Zhao Xingsheng, Shi Keren

Abstract: To discuss textbook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cadre education with larger system and richer content. During its running,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a textbook system with considerable amount, diverse sources and vivid cont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Mao Zedong and other party and military leaders actively promoted and set an example, the team of compilers constantly got improved and enriched, and guiding ideology and working methods were constantly clarified. The textbook system of cadr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is centered on the war and focuses on political reform and emphasizes to incorporate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latest experience of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struggle into textbook.

Key words: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educatio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adre education; textbook history

① 李志民：《抗大第十分校》，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② 尚可：《抗大总校在浆水的片段回忆》，《抗大在浆水》，中共邢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9年编印，第58页。

③ 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